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中国的生育政策与人口问题



中国的『最低生育率』：全球视角和地方视角的思考

杨菊华

风险视角下的独生子女政策研究

陈友华

历史视野下大国人口变迁的比较研究

李建新 郭怡 胡雯

中国国家人口安全形势分析

穆光宗

分包体制下建筑工人的阶级经验和感情

潘毅 卢晖临 张慧鹏



2009年秋季卷总第10期

中國研究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CHINA STUDIES **No.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研究. 2009 年. 秋季卷: 总第 10 期/周晓虹, 谢曙光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5097 - 1986 - 2

I. ①中… II. ①周… ②谢…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 丛刊 IV. ①D668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937 号

中国研究 (2009 年秋季卷总第 10 期)

主 编 / 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董根兴

责任编辑 / 施 敏 田 梅 谢蕊芬

责任校对 / 赵士孝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75

字 数 / 299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986 - 2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字母序列）：

Anagnost, Ann (美国华盛顿大学)
Christiansen, Flemming (英国利兹大学)
Duara, Prasenjit (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 可 (南京大学)
风笑天 (南京大学)
Friedman, Edward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高 华 (南京大学)
关信基 (香港中文大学)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美光行 (日本京都大学)
金光亿 (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强 (清华大学)
李友梅 (上海大学)
林 南 (美国杜克大学)
刘 宏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马 戎 (北京大学)
Mohanty, Manoranjan (印度德里大学)
Perry, Elizabeth (美国哈佛大学)
乔 健 (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 Charles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 Jonathan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 Ezra F. (美国哈佛大学)
汪 晖 (清华大学)
王庚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谢春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简云翔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
刈间文俊 (日本东京大学)
园田茂人 (日本早稻田大学)
翟学伟 (南京大学)
张乐天 (复旦大学)
周大鸣 (中山大学)
周晓虹 (南京大学)

主编：

周晓虹 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张玉林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

编辑：

杨德睿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周培勤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博士)

朱安新 (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做是 1949 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 1978 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具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 19、20 和 21 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都既

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目 录

发刊词 / 1

主题研讨：中国的生育政策与人口问题

- 中国的“最低生育率”：全球视角和地方视角的思考 杨菊华 / 1
- 风险视角下的独生子女政策研究 陈友华 / 34
- 历史视野下大国人口变迁的比较研究
..... 李建新 郭 怡 胡 雯 / 60
- 中国国家人口安全形势分析 穆光宗 / 82

学术论文

- 分包体制下建筑工人的阶级经验和感情
..... 潘 毅 卢晖临 张慧鹏 / 109
- “气”与社会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
——浙东峨村调查 袁 松 陈 锋 / 128
- 村庄政治分层：理解“富人治村”的视角
——基于浙江甬村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桂 华 刘燕舞 / 147
- 天津的全球化战略：从当下出发解读历史 马利楚 / 161
- 中国改革：无锡的故事 曼诺拉简·马哈迪 / 183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的文化政策 周 星 / 210

书评与随笔

从“无讼”到“迎法下乡”：中国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变迁

——评《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 狄金华 / 224

话语的盛宴：世纪末的中国文化叙事

——胡可丽笔下的中国文化现象…………… 尤 红 / 233

谁的国家？

——深圳张家界籍建筑风钻工集体罹患尘肺病调查

…………… 程平源 沈 原 潘 毅 / 243

英文目录与摘要…………… / 256

稿约…………… / 261

中国的“最低生育率”： 全球视角和地方视角的思考

杨菊华*

摘 要 长期以来，人口学家担心的是高生育率问题，并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使人类的生育率徘徊于 2.1 的更替水平上下。然而，不少国家或地区在近些年出现了值得警醒的最低生育率现象。本文将中国的最低生育率置于全球、亚洲视野中，并通过比较各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对其现状、趋势、特点、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低生育率的获得不是孤立与偶然的，而是受到全球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生育转变的影响，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过程、模式和特点与全球及周边地区十分类似，并正在步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尘：不仅一些大城市或发达地区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维持着最低生育率，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也遭遇了该现象。因此，在限制性生育政策推行 30 多年后，政府部门必须直面当今中国部分地区最低生育率的现实和大范围蔓延的潜在危险，及时调整生育政策，防患于未然，以避免难以逆转的、长期的、不利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后果。

关键词 总和生育率 最低生育率 中国 全球视角
省际差异

* 杨菊华，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juhua_yang@yahoo.com）。

长期以来,人口学家最关心的是高生育率及其消极后果,并一致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使人类的生育率最终稳定在更替水平上下,即每对夫妻平均生育2.1个孩子。^①然而,人类的生育行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持续走低。20世纪80年代,德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国家;1990年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生育率均低于1.3。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步其后尘,遍及除非洲和南美洲以外的其他各洲。面对前所未有的低生育率情势,人口学家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来描述该现象——Lowest-low fertility rate (最低生育率)。

最低生育率是过去一二十年间新出现的人口现象,存在的时间不长,涉及的国家或地区不多,我们对其认识不深,对其定义尚不一致。若以总和生育率低于1.3为其标准的话,则不少欧洲和东亚国家或地区都遭遇了最低生育率。在中国,不仅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而且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也出现了1.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无论“最低生育率”的概念如何界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地方的总和生育率都达到了“最低中的最低”。

最低生育率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现象,也不仅是一个数字问题;在现象和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制度、经济、社会、观念、行为等一系列的因素,它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已经并行将对当今和未来家庭和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相应的影响。与生育率过高一样,过低的生育率也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后果更可能是“近喜远忧”(陈友华,2004)。目前,学界已开始研究该人口现象(陈卫,1995;陈友华,2004;郭志刚,2005;陆杰华,2005;穆光宗,2005;杨菊华,2008;原新,2005)。早先的研究一方面引起了更多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对该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奠定了基础。然而,许多相关的主要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究。比如,如何界定“最低生育率”?最低生育率将是一个长期的、永久性现象呢,还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且行将消失的人口现象?中国是否、哪里出现了最低生育率?其现状、特点、趋势如何,原因何在?它将会给中国的人口态势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潜在影响?中国如何避免遭遇像欧洲国家那样的最低生育率的蔓延?怎样有效地在“稳

① 需要指出的是,更替水平所对应的生育率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净再生产率的高低受到死亡模式、死亡水平、生育模式、生育水平及出生性别比高低的影响。100年前,由于死亡率很高,更替水平所对应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4以上,但在目前的死亡率水平下,更替生育水平大约为2.1,其对应的总和生育率的最低值约为2.05。由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很高,更替水平所对应的生育率大约在2.3~2.4(陈友华,个人交流)。

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应对最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本文旨在通过将中国的生育水平置于全球、亚洲视野中，并比较各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对其中的部分问题提出初步思考。这些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它们不仅是人口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它们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其显性和潜在的社会经济后果将是长期而深远的。作为一种新的现象，最低生育率呼唤开拓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呼唤新的理论探索，也呼唤制度的创新。在该现象萌芽之际，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 30 多年之时，从多个视角分析中国最低生育率的现状、趋势、特点、原因及潜在后果具有明确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将有助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未经校正的 2000 年人口普查 0.95‰ 和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汇总资料，历年全国及各省统计年鉴，2007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提供的中方案预测人口数据、^① 美国人口咨询局公布的 2005 年世界人口数据。除特别指明外，本文中的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互用。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由于数据来源、处理方法、估计假设不同，各数据之间难免有相互矛盾和冲突之处。其二，在探讨中国生育率问题时，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是全国和各省区总和生育率数据的准确性。2000 年人口普查和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为 1.22 和 1.33。这两个数据无疑是偏低的，虽然由于进度效应等原因，郭志刚（2005）认为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笔者未对这两次生育率的可信性及可信程度进行分析，故对它们是否可信、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不敢妄言。真实的数据是进行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基础；掌握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数据是探讨所有与之相关问题的关键。令人口学家感到无奈的是，目前还难以做到这一点。

不过，即便这两次的生育率低于实际水平，但这应该属于系统误差，即各省普遍低报。系统性低报主要影响我们对中国生育率现状的了解，而基本不会误导我们对中国最低生育率的特点、趋势、原因和后果的认识和分析。^② 而且，虽然作者并不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 1.22 或

^① 联合国预测全球各国人口时，使用了高、中、低三种不同的生育率方案。在一个封闭人口的环境下，这三种方案假定，2050 年的总和生育率将分别为 2.35、1.85、1.35。

^②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假设的前提条件是各省漏报的趋势大体一致。然而，该假设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各省区调查数据的质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陈友华，个人交流）。

1.33, 但相信该指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更替水平生育率是考察一个国家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态势的影响的重要标志, 也是人口增长的长远趋势的分水岭; 它表明, 中国的人口态势已经终结了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阶段, 历史性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顾宝昌, 2006)。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 探讨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全球生育率发展趋势

(一) 1950 ~ 2010 年全球总和生育率的纵向趋势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 全球范围内的生育水平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图 1 描述了 1950 ~ 2010 年全球各大洲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包括纵向趋势和各大洲在每个时点的横向水平; 为便于比较, 我们也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置于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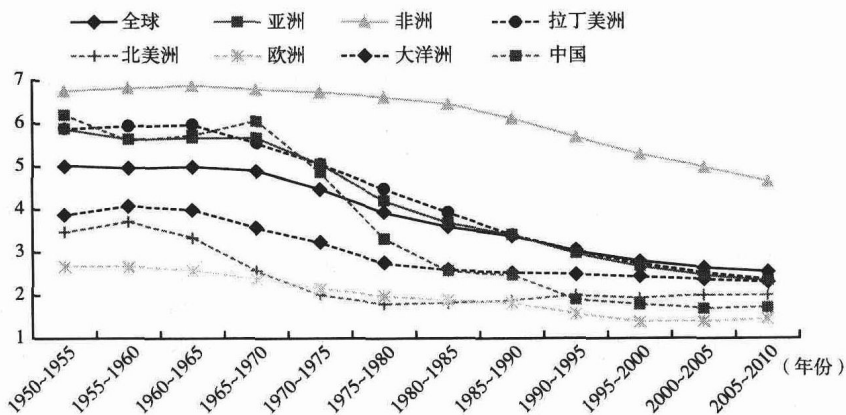


图 1 1950 ~ 2010 年全球各大洲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UN (2007)。

其一, 全球各大洲的生育率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 生育率都已经或开始发生转变, 虽然转变的起点、进程、现状、原因、后果各有不同。生育率转变从欧洲开始, 逐渐蔓延到其他地区。如今, 欧洲和北美洲的总和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 除非洲外, 其他地区也都降至较低水平; 目前, 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于更替

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Wilson, 2004)。

其二, 全球各大洲的生育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多极化特征。尽管各洲的总和生育率都在降低, 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极不一致, 也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承、政治经济制度、生育率的起点、下降的速度和幅度 (Bongaarts, 2001, 2002) 等方面的差异, 各地的生育率异彩纷呈。一些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依旧维持在高位水平; 另一些地区则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由图 1 可知, 目前全球的生育率现状可粗略地划分为三大阵营: 高生育率 (非洲)、极低生育率 (欧洲)、更替水平上下生育率 (美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由于非洲的起点最高、下降的速度最慢, 故其生育率在各洲中最高; 当然, 这里所说的“高生育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高”, 而是相对于其他各洲而言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总和生育率在这 60 年间十分接近, 且自 1980 年后与全球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位居中间; 北美洲和欧洲的起点 (尤其是后者) 很低, 但在 1985 年以后, 前者的生育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甚至有所回升), 而后者持续降低, 在各大洲中一直保持最低水平, 且在 1995 年后降至 1.5 以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起点很高, 仅次于非洲的平均水平, 但在 1970 年后急速下降, 1990 年后降至 2.0 左右, 此后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甚至低于美国和加拿大, 仅高于欧洲。

其三, 全球生育率的趋同步伐明显快于经济的趋同步伐。即便在一些欠发达地区, 生育率也在不断地向低位迈进, 这折射出人类生育行为的趋同趋势, 且该趋势明显快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同步伐。一是洲际趋同: 图 1 清楚地显示, 亚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总和生育率十分接近, 尤其是在 2000 年后; 二是洲内趋同: 2005 年, 世界上大约有 77 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处于或低于更替水平 (PRB, 2007), 主要分布在欧洲、东亚和北美洲。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低于 2.1; 在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斯里兰卡、伊朗、哈萨克斯坦、泰国), 总和生育率均于近年降至更替水平上下。可见, 各地区之间和地区之内的生育率都向低位移动, 且其移动的速度快于经济的趋同速度。

其四, 全球各大洲生育率的洲内差异突出。表 1 将 2005 年各大洲之内的总和生育率细分为数个区段, 这既是出于理论的考虑, 也是为了便于更细致地考察洲际差异。如其所示, 美国和加拿大的总和生育率均在更替水平以下, 但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由于近年欧裔白人生育率的回升和非裔及西班牙裔移民的生育率长期较高的缘故, 美国的生育率一直高于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 处于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2.1 个孩子的更替水平上下。亚洲 51 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布最为分散, 分布于各个区段, 但众数在

2.1~3.0 之间。其中,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位于 2.1 及以下, 但有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依旧很高。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生育率的分布十分接近, 基本介于 1.5~5.0, 但峰值极不同: 前者同亚洲, 在 2.1~3.0, 后者却在 4.5~5.0。欧洲和非洲生育率的集中趋势最为明显, 但方向恰恰相反: 欧洲一半以上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均低于 1.3, 其余国家的也都在更替水平以下; 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生育率主要集中在 5 个孩子以上, 低于 1.8 的国家一个也没有, 两大洲刚好在 1.8~2.1 的区间相交。2005 年, 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1.34, 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 (虽然实际生育率可能高些)。

表 1 2005 年全球各大洲总和生育率的具体分布

单位: 个

地 区	总和生育率区间								
	TER	< = 1.3	1.3 ~ 1.5	1.5 ~ 1.8	1.8 ~ 2.1	2.1 ~ 3.0	3.1 ~ 4.0	4.0 ~ 5.0	> 5.0
亚洲 (51)	2.50	7	1	3	5	16	8	6	5
非洲 (57)	5.10			0	3	4	8	8	34
拉丁美洲 (38)	2.60			3	7	20	5	3	
大洋洲 (17)	2.10			1	2	4	3	7	
北美洲 (2)	2.00		1	0	1				
欧洲 (43)	1.40	22	8	9	4				
中国 (32)	1.34	14	7	10	1				

资料来源: 各大洲数据来自 PRB (2007); 中国 2005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007)。

(二) 1950~2010 年亚洲部分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

全球视角的比较结果表明,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特点与亚洲的比较一致。当将中国置于亚洲并与部分周边国家进行比较时, 我们发现,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居于中等水平 (见图 2), 低于印度和亚洲平均水平, 但高于日本、韩国、新加坡: 在 2000~2005 年间, 后三者的总和生育率大约都在 1.3 以下。日本的生育率一直很低; 韩国和新加坡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点早于中国、降低的幅度超过中国。然而, 无论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 还是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相比, 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取得了很低的生育水平。而且, 中国生育率的急速降低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发生在全球和亚洲总和生育率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之下的,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 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及下降模式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欧洲国家十分接近。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中国未来生育率的走向是否会继续步其后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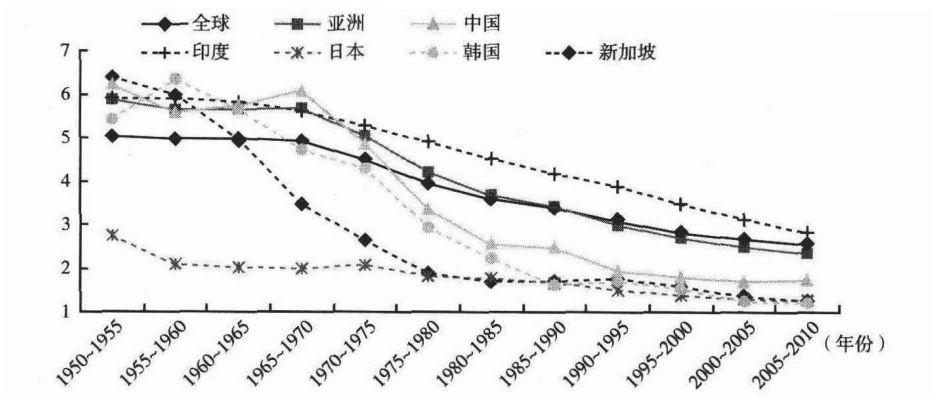


图 2 1950 ~ 2010 年亚洲部分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UN（2007）。

二 最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 rate）的界定

这几张图表给予我们的视角冲击是强烈的、深刻的、震撼的。虽然人口学家们一直认为，人类的生育行为将最终徘徊在 2.1 上下，但实践证明，人口学家的预期（至少在当前的部分地区）落空了，一些地区的生育水平降至历史上可知的最低点。由于现存所有与总和生育率有关的概念都不足以描述这一前所未有的生育情势，于是出现了“Lowest-low fertility rate”这个新概念。此前，人口学家曾用 low fertility rate、very low fertility rate 来形容低生育率。从 low fertility rate、very low fertility rate 到 lowest-low fertility rate 的转变，表明了人口学家的无奈，也说明他们认为人类的生育率达到了最低的极限。Lowest-low fertility rate 被译为“最低生育率”（穆光宗等，2005）、“极低生育率”（陈卫，2008）、“超低生育率”（彭希哲，2008）。本文据其英文字面意思，使用“最低生育率”。

最低生育率是一个较新的现象，学界对此并无统一的界定。目前主要有四种看法：①以 1.3 为界（Kohler et al., 2006）。Kohler 及其同事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 1.3，它就被认为达到了最低生育水平，即 1.3 被界定为最低生育率的临界点。其原因在于，在一个稳定人口中，低于 1.3 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人口总量每年以 1.5% 的速度降低，出生队列降低 50%，45 年内会出现人口总量减半现象；如果总和生育率继续降至 1 左右的话，人口总量每年将以 2.4% 的速度下降，且人口减半的时间缩短为 30 年（Kohler et al., 2006）。②以 1.5 为界（Gubhaju, 2006）。③以 1.8 为

界（王金营等，2004）。不过，后三位学者都没有就该临界标准进行具体的解释和阐述。④理论标准。李建民指出，“最低生育率应该是指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会导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面临减少危机的生育率水平”。人口减少危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劳动力规模缩减，二是人口的高度老龄化，三是人口规模的迅速缩减威胁到国家或民族的安全”。

这些标准都是人为设定的。不同的标准对应着各自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学后果。最低生育率也不是一个具体数值，而是一个区间，它有一个临界点，低于该临界点的生育率都属于最低生育率的范畴。本文以 1.3 为临界点。以此为标准，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欧洲出现了 13 个最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遍布南欧、中欧和东欧各地；在亚洲，中国澳门的生育率最低，只有 0.8，其次为中国香港（1.0），再次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大约为 1.2，新加坡和日本的介于 1.3 及以下（PRB，2007）。可见，与欧洲相比，东亚地区的最低生育率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前所述，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及部分经济尚不发达地区也出现了该现象。比如，2000～2007 年间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0.96、0.79、0.77、0.64、0.88、0.87、0.81、0.95（彭希哲，2008）；在湖北省宜昌地区的长阳和五峰土族自治县，近十年的总和生育率也一直徘徊于 1.0 左右（张宗益，2007）。

三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现状与特点

30 年前，中国推行生育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将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今，即便考虑到漏报问题，该目标也已经实现，且一些地区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这样的生育态势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这表明中国的生育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效；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政府需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但不少地区也面临如何扭转最低生育率局面的新任务，虽然（考虑到数据的低报）其危险性可能尚未迫在眉睫。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使中国的人口态势既不同于 30 年前的特点，也不同于当前其他国家的特点；既面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又遭遇发达国家的问题。

（一）中国生育转变的特点

近 300 年来的人口发展历程表明，生育率的下降往往遵循两种模式（张志刚，1994）。一种是缓降型，即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个逐步的缓慢

的过程，粗出生率从 30‰ 降到 20‰ 通常需要 30 ~ 40 年的时间，发达国家多属此类型。另一种为速降型，即人口出生率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下降，多数国家的人口粗出生率由 30‰ 下降到 20‰ 所用时间通常在 10 ~ 20 年，个别国家只有多数国家的一半甚至 1/4。中国是后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中国的生育转变显示出与全球相似的特点。其一，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见图 3，其左数轴为粗出生率，右数轴为总和生育率）。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 20 世纪 50 年代极高，但自 60 年代后期开始快速下降：1970 ~ 1975 年间急剧降至 5 以下，1980 ~ 1985 年间降到 4 以下，1990 ~ 1995 年间首次低于更替水平，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00 年和 2005 年继续走低，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就粗出生率而言，1955 年前，中国的粗出生率高达 44‰，1955 ~ 1960 年间降至 36‰，且在此后进一步大幅度下降，1990 年后降至 20‰ 以下，并持续下降。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尚欠发达的转型国家，中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如此之快、程度如此之深，在发展中国家是为数不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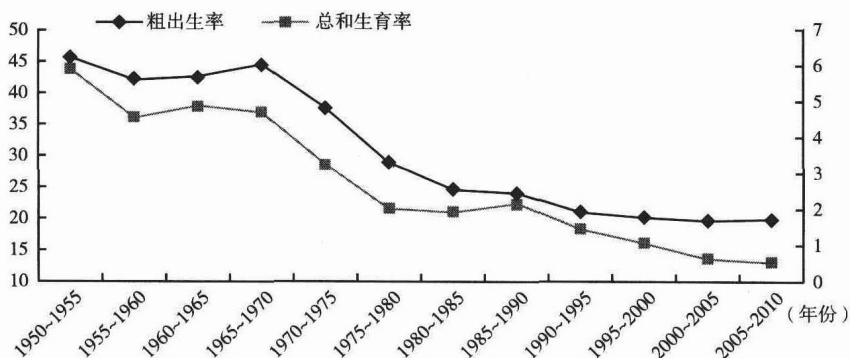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 1950 ~ 2010 年粗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UN (2007)。

其二，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和幅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由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加上生育政策及其推行手段和力度相异、生育率的起点不同，各省区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下降幅度和总体水平很不一样（见表 2）。就总体水平来看，三个直辖市、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生育率始终最低，贵州、宁夏、广西等省区的一直最高。就下降幅度而言，在 1955 年和 2005 年间，降幅最大的是三个直辖市，降幅最小的（除西藏、新疆外）是安徽、江西和贵州三省；在 1981 ~ 2005 年间，降幅最